

#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就

方长平 周方银 卢光盛 刘 卿 韩爱勇

【编者按】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构成，十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理论不断创新，实践工作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周边外交的意义从经济、安全考量上升为国家战略，理念从功能合作到感情升华，目标从稳定周边到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目前，国际及中国周边秩序在经历复杂变化，中国相应调整周边外交的政策、主张及措施，在地区秩序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周边外交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东盟成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区。党的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将中亚和东盟确定为两个优先方向，开拓出西亚和太平洋岛国两个新增长点，取得了多层面的进展和突破。为纪念中共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十周年，2023年9月16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论坛》编辑部、国际关系学院组织召开“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十余所高校、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就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进行深入交流并形成相关研究成果。《国际论坛》编辑部组织专家撰写笔谈，以飨读者。

【关键词】中国周边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秩序；东盟；中亚

【作者简介】方长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邮编：100872）；周方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广州 邮编：510420）；卢光盛，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昆明 邮编：650091）；刘卿，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05）；韩爱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北京 邮编：100091）

【DOI】10.13549/j.cnki.cn11-3959/d.2023.06.001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23）06-0003-33

#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sup>\*</sup>

方长平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周边外交工作不仅助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稳定，也促进了中国与周边的区域合作，为“一带一路”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周边依托，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试验场。周边外交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重要成就，很大程度上在于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理论的创新。自2013年中共中央召开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诸如亲诚惠容、周边命运共同体等，这些理念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推动了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不断取得新成就。十年来，尽管国际和周边环境发生了变化，但习主席倡导的周边外交理念经受住了考验，继续指导中国周边外交不断取得新成就。

## 一、周边外交的意义：从安全、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

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有一个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就处于冷战的格局中，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加之冷战期间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安全问题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考量，周边外交首先是确保中国边界安全稳定，周边外交的安全意涵凸显。

随着集团对抗局面在周边的崩塌，中国与周边主要国家陆续恢复或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鉴于当时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提出了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主张，对我国和邻国之间存在的争议问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加快，双方的合作进入了制度化的轨道。由此，经济合作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考量。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周边环境及周边关系明显改善、区域多边合作持续深入的情况下，将“与邻

---

<sup>\*</sup>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周边外交中的中小国家因素”（批准号16ZGA002）的阶段性成果。

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明确为周边外交政策理念。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增加了强调“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的内容表述。2012年，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对中国的周边外交作了重要而全面的论述，指出：“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sup>①</sup>应该说，冷战结束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前，周边外交更加强调互利合作的一面，经济因素成为周边外交的主要考量，互利合作成为中国与周边关系的主要形态。

在2013年中央召开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sup>②</sup>习近平总书记从客观、主观两个方面强调周边对我外交的意义。客观方面主要是地理方位和自然环境，是相对稳定的；主观方面，中国与周边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审视我国的周边形势，周边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我国周边充满生机活力，有明显发展优势和潜力。”<sup>③</sup>以上因素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提供了优越条件。2013年中国与周边关系处于较好时期，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包括与美国的关系，也处于相对稳定时期。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强调要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看待周边外交，强调要重视周边的战略意义。当然，在实践层面，中国周边外交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从周边对我经济发展的意义上展开的。

美国奥巴马政府后期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频繁挑衅，周边外交的安全意义开始上升。随着特朗普、拜登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的全面展开，周边外交的安全战略意涵急剧提升。一方面，无论是国内经济的发展还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都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稳定，中国成为周边绝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周边对中国发展的经济意义很重要，中国与周边的经济合作依然是主流；但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全面展开，尽管中美的战略竞争是全球性的、全领域的，但重点还是在周边，美国正在中国周边重塑其盟伴关系体系，加速推进其“印太战略”和“印太经济框架”，并利用中国周边安全的热点问题，加大对本地区敏感问题的直接介入力度，对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构成严重威胁。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52—153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53页。

因此,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周边面临的形势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过去我们面对的周边外交问题主要是边界问题,涉及中小国家及地区组织居多,周边是相对封闭的,或者说是“小周边”,尽管域外大国对周边的影响一直存在,但是基本在可控范围内,并没有构成系统性威胁,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还是可做相对区分的。2003年胡锦涛在驻外使节会议上首次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布局,把周边置于中国外交布局的首要。2006年,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布局。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在争论,关键和首要到底何者更重要?在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美国深度介入中国周边和亚太事务背景下,中国的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已然高度重叠与融合,中国的大国外交周边化、周边外交大国化已然成为现实,美国及其盟国正在把中国周边打造成遏制中国的前沿地带。有学者认为,如何从周边角度思考中国与大国关系,以及如何思考及应对中国大国外交中的周边因素,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战略必须系统谋划的全新课程。<sup>①</sup>中国的周边外交意义已经不只是谋求周边的稳定与发展,而是事关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战略意义空前突出。

## 二、周边外交理念：从功能合作到情感升华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在2013年的周边外交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这两点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然后,他进一步阐述了亲、诚、惠、容的具体内涵:“亲”主要是指“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诚”是指,“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惠”是指,“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容”是指,“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这些理念,首先我们自

<sup>①</sup> 袁鹏:《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思想与战略布局》,《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1期,第4页。

己要身体力行，使之成为地区国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sup>①</sup>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是对过去外交理念的继承与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的重要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过去我们长期坚持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仍然重要，但这两点相对比较宏观、抽象，而“睦邻、安邻、富邻”这样的动宾结构又相对比较以我为主，互动不足，且把与周边关系聚焦到睦邻、安邻、富邻似乎又过于具体，意犹未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亲、诚、惠、容的新理念更全面、更具体，更强调互动性而不是以我为主。第二，在亲、诚、惠、容的四大理念中，把“亲”与“诚”这样带有情感性的表达置于“惠”与“容”相对比较理性的表达之前，这本身就体现了我们的一种理念创新。“亲”“诚”过去更多描绘的是人与人之间一种社会关系，把周边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定位为一种社会关系，既显示我们重视人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对国家间关系发展的支撑作用，也表明中国对国家间友好关系的一种情感升华，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在外交上的体现。第三，在这四大理念中，“惠”“容”相对比较具体，这里的“惠”，强调是互惠，而不只是中国一方的发展惠及他国，他国的发展同样也可以惠及中国，互惠而不是一边惠及，体现中国对发展周边关系的一种均衡态度；“容”强调的是包容，强调发展的包容性，亚太地区不仅有中小国家，也有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强调发展的包容性，既是中国倡导的地区合作乃至全球治理的理念，也是对主要大国意图在本地区建立一种排他性体系的回应。

### 三、周边外交的目标：从稳定周边到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中国周边外交的目标首先是为中国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这是任何一国外交的使命。但是，随着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周边对中国外交的战略意义凸显，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长期战略目标。这既是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周边实践，也是周边外交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历史使命。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周边区域构建的最新定位，而这样的定位和努力是着眼于中国复兴大局下周边关系和秩序百年重构的长历史进程，<sup>②</sup>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长期目标。

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国在国际社会倡导人类命运共同

<sup>①</sup>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53页。

<sup>②</sup> 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21页。

体理念首先是在周边提出的。党的十八大后,2013年3月习近平首访俄罗斯,第一次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201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进一步提出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随后在印尼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上首提“亚太命运共同体”。在周边不同场合阐述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2014年在中央外事工作会上正式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此之后,2015年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提出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联合国峰会上进一步提出“五位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路径;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习近平“命运共同体”理念最终形成。从“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来看,经历了周边双边(中俄)、区域(东盟)、多边(亚太),直至面向世界(联合国)提出倡议理念的路径过程。有学者总结,周边国家和周边地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和建设的始发之地、重点之地、关键之地、示范之地,也是决定兴衰成败之地。<sup>①</sup>

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如何构建成为一个国内外各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在亚太地区搞阵营化对抗的背景下,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不是过于理想化了,过于超前化了?笔者认为,在当前背景下更要强调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

尽管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构成上还有一定的分歧,但基本形成共识的是,地缘相近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客观基础,经济合作与发展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支撑,安全合作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形成的重要保障,人文相亲与交流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手段。从经济合作、安全合作到人文交流,这是一个理想模型。在当前背景下,我们要继续把经济合作的红利做大,更大规模地促进人文交流,但也不能回避如何进行地区安全合作的问题。在当前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美国事实上要求本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背景下,包括中美在内的本地区安全合作确实面临挑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要考虑如何从安全合作的“一荣俱荣”,到安全不合作可能导致的“一损俱损”对安全共同体意识的影响。事实上,无论是美国要给中美关系加护栏,防止中美走向直接冲突,还是地区主要大国对台海危机、南海问题可能引起的地区冲突的忧虑,都表明本地区国家对共同安全的考量在上升,“不能打仗、不想打仗、不打仗”

<sup>①</sup> 石源华:《中国周边学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世界知识》2020年第1期,第72页。

应该成为本地区安全共同体意识构建基础。中国不仅要恪守以上理念，更要将这种理念在本地区广泛传播。

当前中国的周边环境异常复杂多变，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经常存在，周边外交正在面临大变局。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周边外交内涵不只是我们过去理解的周边外交，今天的周边外交同样包含了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以及与国际组织的多边外交，甚至政党外交在周边也异常活跃。必须承认，过去中国的周边外交比较偏重于发展中国家外交，这点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真、实、亲、诚理念与周边外交的亲、诚、惠、容理念高度相似也可看出；今天中国的周边外交正在向大国外交主导的局面发展，周边外交的竞争性、冲突性一面在上升，因此，中国总体外交理念中的底线思维、斗争精神也应该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理念的重要内容。

## 国际秩序调整与中国周边外交<sup>\*</sup>

周方银

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国际环境出现了很大变化，这一时期，国际秩序也在经历复杂的调整过程。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周边环境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周边外交面临的外部环境，中国周边外交也顺应这一变化做出了适度的调整与优化。

### 一、国际秩序在经历复杂调整

当前，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变革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国际秩序的转型与调整。对于国际秩序，有几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方式是把国际秩序理解为国际规则、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阿拉加帕认为，国际秩序指国家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这些安排提供

---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地区秩序转型背景下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22ZDA128）的阶段性成果。

了稳定和可预期的国际环境,使国家能够通过基于规则的互动追求诸如和平解决争端等集体目标。<sup>①</sup>基辛格认为,不同类型的秩序“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一套明确规定了允许采取行动的界限且被各国接受的规则,以及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sup>②</sup>第二种方式是把国际秩序理解为国际行为的模式。布尔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国际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维持整个国家体系和社会本身、维护个体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持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和平、对暴力行为加以限制、遵守国际条约等。<sup>③</sup>第三种理解认为国际秩序代表了国与国关系的一种稳定状态,其核心特点是行为的可预期性。唐世平认为,国际秩序的核心是社会系统内部正在发生事情的可预测程度。<sup>④</sup>周方银认为,国际秩序是国家在一定国际格局下为实现自身利益,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据此,国家行为模式具有较高可预期性,国际行为体对国家间的互动形成稳定和可靠的预期。<sup>⑤</sup>

如何认识国际秩序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人们对国际秩序的理解。按照第一种理解,国际秩序的转型,就是国际体系中规则、规范、制度的变化;按照第二种理解,国际秩序的转型意味着国家的行为方式从一种模式转变为另一种模式。按照第三种理解,国际秩序的转型是国家间关系从一种稳定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过程。

学者们普遍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实力结构、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国际价值观是构成国际秩序的基本要素。贺凯和冯惠云据此把国际秩序分成三个层次,然后提出了相应的国际秩序转型的三种类型,即国际秩序的系统转型、国际秩序的格局转型和国际秩序的制度转型。<sup>⑥</sup>李慧明认为,国际秩序转型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基于国际主流价值观转变的国际观念转型、基于国际规范与制度变迁的国际制度转型以及基于国际规则制定权转移的国际领导转型。<sup>⑦</sup>

---

①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9.

②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序言,第XVIII页。

③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3—15页。

④ 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187—203页。

⑤ 周方银:《国际秩序变化原理与奋发有为策略》,《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43—59页。

⑥ 贺凯、冯惠云:《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转型:一种类型化分析》,《当代亚太》2020年第3期,第4—29页。

⑦ 李慧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秩序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8期,第4—33页。



不管如何从概念上理解国际秩序转型,就其内容而言,国际秩序的转型基本包含了以下一些方面的变化:首先是国际体系中实力结构的变化,这突出表现为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重要行为体的实力关系变化,其中,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具有最突出的影响。其次,是国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变化。长期以来,美国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领导和维护者,但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修改国际规则来约束中国、从国际体系中获取更直接的利益,以维护美国的优势地位,这一点自特朗普政府以来表现得更为突出。第三,是国际体系中的观念变化。观念变化往往以实力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变化为基础和动力,但同时有其自身的逻辑。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时各国的行为观念,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也会对国际行为体的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同时,行为体的观念变化又会反作用于国际行为体的行为。

## 二、地区秩序调整影响了中国周边环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进程

在国际秩序调整的同时,周边地区秩序也在经历变化过程,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次,中国是地区秩序转型的重要变量,同时在地区秩序转型过程中承受着巨大压力。秩序转型的首要动力往往源自实力结构的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力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快速发展,构成秩序转型的基础性动力。中国实力的上升、新兴国家实力的群体性增长在全球层面导致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单极体系逐步瓦解,同时也颇为深刻地改变了东亚地区的力量对比。中国实力上升以及美国针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改变了本地区主要行为体之间的战略关系,这突出表现为美国强化在这一地区的联盟体系,提升美日印澳安全合作水平,该地区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结构得到进一步强化。美国为了维护其主导的全球秩序与东亚秩序,采取了多方面措施挤压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抑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提升。从长期来说,美国更为在意的是中美实力对比的走势,试图通过恶化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影响和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降低中国的发展速度,更为根本地消除中国对其霸主地位的威胁。作为体系内最强大国家,美国采取的高度具有针对性的做法,使中国在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

其次,地区秩序调整使中国的周边环境表现出新的特点。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举行时,中美战略竞争并不很激烈,当时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就事论事地分析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而不必过于考虑美国因素的影响。此后,随着美国对中国周

边事务介入程度越来越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已很难就事论事地分析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双方之间的很多事情演变为复杂的中美邻关系。因为美国的逻辑是，如果不能改变中国的发展路径，那就塑造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sup>①</sup>对于任何具有一定重要性的周边问题，在分析其发展方向时，不能不考虑美国可能施加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周边热点问题的管控变得更加困难，其解决显得更为遥遥无期，因为周边热点问题客观上成为了美国插手地区事务、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方便抓手。从美国的视角看，地区经济合作的逻辑发生了改变，出发点不是其是否能给本地区国家带来共同利益，而是这一地区合作的实现是否会导致中美地区影响力的消长，或者中美哪一方能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对于可能导致中国影响力上升、美国影响力消退的地区合作，美国积极反对或采取抵消性的措施；地区制度安排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美国试图以各种方式在周边地区制定对其有利、对中国不利的规则，用规则对中国进行束缚。美国试图以意识形态划线，强行把中美战略竞争解读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sup>②</sup>拜登政府将意识形态因素融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的做法，扭曲了国与国关系中关于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原有认知，对本地区的观念产生了一定影响。未来一个较长时期，中美关于地区事务的不同观念依然将会会有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

此外，中国的行为已经对周边秩序的演化进程和方向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美国、周边三方的复杂互动过程中，中国的反应对地区秩序具有很强的影响和塑造作用。一个重要的体现是，周边地区没有形成阵线分明的对立阵营，中国与美国的主要盟国和安全伙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在大国竞争过程中，美国积极推动形成高度对立、阵线清晰的阵营，试图用这一方式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虽然美国的许多做法具有挑衅的意味，但中国没有采取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做法，不赞成以集团对抗的方式进行竞争，不增大周边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积极为其提供在中美之间的缓冲空间。中国的做法显著减缓了本地区国家间关系的阵营化，降低了大国对抗的激烈程度。其结果是，尽管美国采取了十分激烈的反华措施，但中美仍未陷入高强度对抗的“冷战”状态。

---

<sup>①</sup> Ant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sup>②</sup> The White House, "Renewing America's Advantages: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1,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 三、中国周边外交对秩序转型的适应与调整

2013年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发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变化,这一演化过程还在继续。周边环境的变化客观上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开展构成重要制约。在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底色和大的努力方向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周边外交的具体政策、主张和举措随着环境的变化进行适度的调整与优化。中国周边外交对秩序转型的适应与调整及其对地区秩序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变化的周边环境下,中国周边外交坚持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念,周边外交政策沿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营造良好周边环境的方向展开,保持了高度连续性,并成为了影响周边秩序的重要因素。中国周边外交坚持奉行一系列重要理念,包括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坚持“以义为先、义利并举”的正确义利观,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致力于睦邻友好等。自2021年9月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国际上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sup>①</sup>“三大全球倡议”涉及发展、安全、文明关系等重大议题,契合周边外交的理念与原则,从多方面切中周边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挑战,为本地区发展、安全与文明关系等问题的解决指出了方向,提出了行动路径。中国周边外交的一系列理念、原则与倡议具有明确的秩序含义,因为它们都内在地要求本地区国家采取与其相适应的行为模式。如果这样一种体现互利互惠、开放包容、命运与共、守望相助思维的行为模式得到普及,将改变本地区国家之间的互动方式。以这样的互动方式为基础而形成的秩序模式,不管具体采取什么样的表现形式,都将有利于本地区的共同发展,给本地区国家带来普遍性的利益。同时,中国倡导的周边外交理念还需与本地区存在的其他理念相竞争。美国推行的权力政治、大国竞争、阵营对立、脱钩断链等政策的背后是另一套关于国与国关系的理念。不同理念的竞争是一个长期过程,中国对于自身理念的倡导与坚持,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大国竞争、减少周边地区的矛盾与对立、避免本地区陷入高强度阵营化对抗的作用。

其次,夯实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利益基础,拉紧与周边国家的多方面利益纽带。中国周边外交的部分理念具有一定超前性,当今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强调各国的国家利益优先,要让大多数国家超越其狭隘的国家利益考虑还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sup>①</sup> “三大全球倡议”的内容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68—469页、第451—452页;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第2版。

为此, 需要把中国倡导的具有超前性的周边外交理念与大多数周边国家对其现实利益的高度关注进行有机结合, 一方面继续推动中国周边外交的理念与倡议走深走实, 同时得到周边国家较为稳定的政策呼应与支持。不管未来这一地区形成什么样的秩序, 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坚实和不断强化的微观利益基础, 都会构成影响该秩序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态势的重要因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关系是否能够抵抗国际环境中不利因素的冲击, 是双方利益基础稳固程度的一个重要体现, 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了过去几年国际形势变化的检验。以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为例, 在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美联储激进加息等导致世界经济低迷、全球贸易大幅波动的背景下,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持续上升。东盟在2019年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后, 2020年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的最大货物贸易伙伴。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 2019至2022年, 中国对东盟的商品进出口总额分别为6414亿美元、6846亿美元、8782亿美元和9753亿美元, 四年累计上升了52%。<sup>①</sup> 在全球贸易受到很大冲击、表现出高度不稳定性的情况下, 中国与东盟贸易在总量已经很高的基础上出现的这一快速增长势头颇为惊人。2022年11月,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正式启动, 谈判将涵盖货物贸易、投资、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等领域, 打造更加包容、现代、全面和互利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此外, 中国东盟就全面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积极开展合作。在当前世界多个地区的区域合作处于低潮的背景下, 中国东盟开展的经贸合作是国际经贸合作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亮点。

再次, 在巩固利益关系的基础上, 强化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 不断提升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水平。当前,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一个体系庞大、结构复杂、覆盖面广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其中,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伙伴关系水平最高, 在周边的伙伴关系网络最为密集, 包括与俄罗斯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两个最高层级的战略伙伴关系, 以及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与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等等。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既是双方良好合作关系的体现, 同时也为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提供了支持与保障。在伙伴关系外, 中国积极在周边构建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双边命运共同体, 逐步形成双边命运共同体的网络。中国与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站,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302277/4899681/index.html>。

等周边国家明确宣示积极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努力方向，中国还与柬埔寨、老挝签署了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行动计划，使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有了更有力的政治保障与更清晰的行动方向。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中国积极推动构建区域层面的命运共同体，包括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等。

最后，弥补在安全领域塑造秩序的能力短板，提升引领和塑造周边安全秩序的能力。美国在东亚安全秩序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一影响力既基于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周边安全秩序不能完全由美国按照其意图和设想来塑造，尤其是不能塑造一个不符合本地区国家安全利益的安全秩序。为此，中国领导人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团结精神适应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认为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主张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从而实现普遍安全、共同安全，主张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sup>①</sup>在安全问题上，中国不把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人，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支持和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和架构，秉持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等“东盟方式”，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安全对话与合作。近年来，尽管面临中美战略竞争和国际形势动荡变革的局面，中国仍通过在安全领域的政策实践，较为充分地展现了自身在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与有效作为，其中比较突出的事例包括：与阿富汗邻国、上合组织成员合作，协助阿富汗稳定国内形势；根据全球安全倡议精神成功推动沙特与伊朗复交，在推动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缓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周边热点的管控上，采取积极和灵活的态度，与周边国家进行充分的对话与协商。其结果，虽然中国周边存在多个热点问题，但在动荡变革的国际背景下，面对美国对热点问题的频繁挑动，这些热点问题依然总体上得到了较为有效的管控，没有演变为直接的武装冲突。这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少热点问题的态势形成不小的反差。

总体上，在地区秩序转型与调整时期，周边国家的心态变得更为复杂，其对未来的预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并不急于塑造地区秩序，而是顺应周边国家的意愿，以务实的方式推进符合各方利益的互利合作，积极在地区秩序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

<sup>①</sup>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3年2月21日，[https://www.mfa.gov.cn/wjbxw\\_new/202302/t20230221\\_11028322.shtml](https://www.mfa.gov.cn/wjbxw_new/202302/t20230221_11028322.shtml)。

# 周边外交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sup>\*</sup>

卢光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的重大部署。<sup>①</sup>作为全方位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周边外交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

## 一、周边外交新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诠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工作，于2013年10月召开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中国周边外交基本方针时，首次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sup>②</sup>为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

### （一）“亲诚惠容”理念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方针的新发展与新要求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周边外交一直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视促进周边和平、稳定、发展为己任”。<sup>③</sup>进入21世纪，在周边外交工作全面、深入的推进过程中，系统的周边外交基本方针逐步成型。2002年11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五个家园’维度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批准号:22AZD106)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工作站(项目号:2022GZZH01)资助。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4页、第60页。

②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

③ 习近平:《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1月8日,第2版。

伴”；<sup>①</sup>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提出“睦邻、安邻、富邻”。

“亲诚惠容”是对“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继承、凝炼、升华与发展。“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侧重理念原则，“睦邻、安邻、富邻”侧重方式方法，“亲诚惠容”则兼及理念原则与方式方法。“亲”在理念原则上强调“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在方式方法上提出“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诚”在理念原则上强调“诚心诚意”，在方式方法上提出“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惠”在理念原则上强调“互惠互利”与“利益融合”，在方式方法上提出“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容”在理念原则上强调“包容”，在方式方法上提出“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sup>②</sup>“亲诚惠容”有体有用，使得中国周边外交所依循的一系列思想、理念、方针、政策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基本方针。

## （二）“亲诚惠容”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2013年，可以被视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成型过程中的一个“大年”。这一年，习近平先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正确义利观、“一带一路”倡议、“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等一系列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原则、目标、方针和路径。这些理念和政策构想，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序列性，在逻辑上则是“吾道一以贯之”的一脉相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这一系列理念和政策构想的统领，也即“道”之所在。

“亲诚惠容”理念也与这一系列理念和政策构想相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中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

---

<sup>①</sup>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67页。

<sup>②</sup>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

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sup>①</sup>“亲”体现了建成“和睦的大家庭”的理念，它一方面强调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式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强调了周边外交工作的指向，即建立和睦的“亲”缘关系；“诚”强调了肝胆相照下的和谐共生，也就是“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惠”致力于“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倡导中国与周边国家错位协同、互惠共赢；“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道破了“容”的客观状态，客观决定主观，在外交实践中我们应当秉持包容的理念与态度。

## 二、新时代周边外交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体两面。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周边外交，事实上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一个重要环节。

### （一）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落脚点

长期以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始终坚持的外交政策宗旨。进入新时代，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核心目标与任务。在外交实践中，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中国面向不同的对象先后提出了多个国家间双边命运共同体和区域性命运共同体。在双边层面，中国同老挝、柬埔寨、泰国、印尼、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明确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在区域层面，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先后提出，部分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早期成果。在全球层面，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统领下先后提出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等领域性命运共同体。

无论在地域上的双边层面还是区域层面，这些命运共同体总体上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集中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二是主要面向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两大特点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外交工作总体布局中的“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在面向周边、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中，构建多形式、层次的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

---

<sup>①</sup>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第2版。



国外交的主要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sup>①</sup>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一系列周边性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主轴。以作为中国周边外交优先方向的东南亚为例，在2013年10月赴印尼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1次领导人会议并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便提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21年11月，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以共建“五大家园”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 （二）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步

在地域层面，一系列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建设围绕中国周边地区展开，事实上是由客观存在和具体的、历史的客观实践决定的，也即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规律所决定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是中国的周边，中国也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周边，互为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客观上在地缘、文缘、人缘上存在“剪不断”的“亲”缘关系，在具体的、历史的客观实践中本身已经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一系列周边性命运共同体相较于其他地域层面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换句话说，在“有”这个层面，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事实上已经达成了命运共同体的事实。

当然，在全球化的时代，全人类在“有”这个层面事实上都已经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只不过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更为凸显、更为“强”，已经走到了从“有”到“好”的门槛之上。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中老、中柬、中印尼、澜湄国家、中国—东盟、上合组织等一系列周边性命运共同体，事实上指的是构建一个“好”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好”，就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中国在发展对外关系中面向部分国家和地区提出建设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就是认可在“有”这个层次与之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反之亦然。周边命运共同体在“有”这个层次可以说是具有最高水平的命运共同体之一，是最具有条件率先建成“好”的命运共同体的区域性命运共同体之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先行先试意义。从地域上讲，周边命运共同体也是衔接国与国间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及跨区域性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中间环节。

<sup>①</sup>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 三、“三大全球倡议”是新征程上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指南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强调的是从“有”到“好”的建设过程，“一带一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建设平台，“三大全球倡议”则为“好”的建设提供了“施工蓝图”。

#### （一）“三大全球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支柱，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指南

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以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在实践中，中国人民及一切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国人民，对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与认识也在不断地优化与深化。面对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这“三大全球倡议”，以高度的全人类关怀先后回答了“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怎样实现全球发展”“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怎样实现普遍安全”“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文明理念、怎样实现交流互鉴”，<sup>①</sup>为全世界贡献了新的高质量国际公共产品。

“三大全球倡议”本质上都是在高度体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人类如何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中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行的深刻回答，其首要关切是人类社会发展，指向的是可持续的“好”的生存与发展。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发展和安全的联结最终指向的是文明的现代化，也即“好”的人类社会发展。“三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实践指明了具体的前进方向与蓝图方案，也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分进程、子环节提供了新的指南。

#### （二）中国周边是落实“三大全球倡议”最具条件的地区，宜成为“三大全球倡议”落地的先行试验区

“三大全球倡议”指向的是“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而中国周边地区是最

---

<sup>①</sup> 刘建超：《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的内在关系》，《人民日报》2023年8月8日，第9版。

具条件建设“好”的命运共同体的地区，事实上也就是最具条件落实“三大全球倡议”的地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已普遍建立起良好的政策沟通机制，与东南亚国家已初步实现了发展战略对接、合作规范融合和发展规划协同，<sup>①</sup>以东南亚、中亚为代表的中国周边地区有望成为落实“三大全球倡议”的先行示范区。从发展角度讲，“亲、诚、惠、容”的“惠”已经借助“一带一路”和一系列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表现得较为明显，“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使中国发展红利惠及周边的同时，也使周边的发展反向惠及了中国，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初步实现了互惠互利、携手发展的格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东盟在2020年首次实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调整，高水平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有望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基石，地区发展有望成为全球发展的先导。

从安全角度讲，传统安全问题迎来冷战后一个新的高发时间点，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渗透到世界各个领域。相较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中国及周边地区在传统安全方面实现了风险总体可控，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实现了较高水平的风险防范与协调应对，业已实现初步的普遍安全、共同安全。在新冠疫情的早期冲击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取得了较好的携手抗疫成果，展现出了高度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从文明角度讲，中国及周边地区在携手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文明交流互鉴氛围，丝路精神也伴随“一带一路”建设在中国周边国家逐步获得认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文明成果在周边地区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国及周边地区已携手同行在现代化之路上。

## 周边外交视域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

刘 卿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周边外交。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

---

<sup>①</sup> 王子奇、卢光盛：《“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沟通》，《南洋问题研究》2023年第2期，第18—20页。

上强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sup>①</sup>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优先发展方向，是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倡地区之一。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至今已历时十年。十年来，中国和东盟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互利合作日益交融，命运与共认同不断增强，制度性合作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东盟关系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sup>②</sup>

## 一、东盟是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区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一个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总体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概念。以后，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习近平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发表演讲，深入、系统地阐述这一重要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sup>③</sup>这句话高度凝练了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也向世界亮明了中国希望与各国共同努力的大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sup>④</sup>构建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已被载入中国宪法。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各方向、各个领域全面铺开。

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要一环。中国政府一直把周边外交放在外交战略的重要位置。进入新时代，国际战略和经济重心不断向亚太转移，周边外交在中国发展全局和外交大局中作用进一步凸显。2013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要“让

---

① 习近平：《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52页。

② 《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8日，第1版。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7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0页。

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sup>①</sup>“命运共同体意识”意味着要更加紧密地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sup>②</sup>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形势下不断拓展和深化外交战略布局提出要求，其中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明确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自此以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双多边外交核心概念。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周边区域的自然延伸，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东盟是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区。中国与东盟山水相依、人文相亲、心手相连。中国始终将发展与东盟的睦邻友好关系作为优先方向。在东盟对话伙伴中，中国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一个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第一个公开表示愿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第一个确定同东盟建立自贸区，第一个明确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第一个与东盟制定双方中长期愿景规划。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首次提出同东盟国家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愿景，<sup>③</sup>中国相继同柬埔寨、老挝、缅甸、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2021年，中国与东盟举办建立对话关系三十周年纪念峰会，双方确立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示范效应，有力地推进中国同其他周边地区命运共同体建设。2023年5月，中国同中亚五国签署《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共同宣布“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sup>④</sup>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所展现的强大影响力和感召力，也将为中国与南亚、东北亚地区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大的动力。

---

① 习近平：《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55页。

② 习近平：《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53页。

③ 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第2版。

④ 《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人民日报》2023年5月20日，第2版。

## 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主要内涵

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强调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弘扬亚洲价值、升华经验共识和追求共同理想三个方面。

第一是弘扬亚洲价值。亚洲价值观反映了亚洲各国和地区发展和制度建设的亚洲文明性，是中国东盟的集体认同，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基础。这一价值观强调共识、和谐、团结，关注的是大多数的人，考虑的是集体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主张亚洲人民应该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来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主张的“亚洲价值观”主要包括：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些价值观主要源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同时也有现代的成分，包括尊重个人权利、接受市场经济等。<sup>①</sup>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认为亚洲价值观强调传统和道德作用，注重家庭、婚姻，尊重权威（家长、老师和政府），强调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优先，群体社会利益优先，而不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优先，重视社会稳定，依靠达成共识而不是通过对抗解决问题。<sup>②</sup>概而言之，亚洲价值观强调集体、自律责任、多元包容、协商共识、和谐有序。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对亚洲价值观的弘扬和发展。习近平深刻指出：“我们照顾彼此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路径，以真诚沟通增进理解和信任，以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和问题，共同维护和弘扬亚洲价值观。”<sup>③</sup>

第二是升华经验共识。中国东盟过去三十多年来形成了集体合作共识，这些共识是推动双方关系向命运共同体建设迈进的经验基础。习近平高度概括了中国东盟合作经验：一是相互尊重，坚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二是合作共赢，走和平发展道路；三是守望相助，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四是包容互鉴，共建开放的区域主义。<sup>④</sup>这些经验是中国和东盟的共同财富，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提质升级。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开展合作，编织

---

① 李保英、高奇琦：《“亚洲价值观”与新加坡民主政治》，《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第175—180页。

② 陈中和：《马哈蒂尔的治国观：伊斯兰与亚洲价值》，《文化纵横》2018年第4期，第48—57页。

③ 习近平：《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3日，第2版。

④ 习近平：《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3日，第2版。

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倡导包容思想,强调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sup>①</sup>2023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时指出,亚洲地区国家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亚洲特色发展道路。<sup>②</sup>中国东盟互动模式可概之为“亚洲方式”,强调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照顾彼此舒适度。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强调指出,地区国家互相尊重,以“亚洲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sup>③</sup>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双方合作经验升华的必然结果。

第三是追求共同理想。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是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等多领域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其核心目标就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一是共建和平家园。反对冷战思维,抵制阵营对立,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发展环境。二是共建安宁家园。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引领,通过平等对话增进信任、友好协商妥处分歧,共同维护本地区的长治久安。三是共建繁荣家园。持续开展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领域拓展新增长点。四是要共建美丽家园。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合作,推动清洁能源合作和农业绿色发展行动,致力于构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促进可持续和低碳发展,共同打造本地区的蓝天净土。五是要共建友好家园。更好发挥地缘相近、文缘相通优势,加快恢复人员往来、推进民间交流合作。在文化、旅游、智库、媒体、妇女等领域打造新亮点,共同推动双方人民赓续友谊、亲上加亲。

### 三、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挑战

就有利条件而言,首先,利益日益交融为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物质基础。2003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时,东盟是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是东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如今20年过去了,中国和东盟已连续三年互为对方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在2022年接近万亿美元,比20年前增长了12倍多。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有力推动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最终达成和顺利实施。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在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智慧城市、

① 习近平:《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53页、第154页。

② 《习近平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2023-03/31/content\\_5749538.htm](https://www.gov.cn/yaowen/2023-03/31/content_5749538.htm)。

③ 《中国发出维护亚太和平响亮声音》,《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6月18日,第6版。

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方兴未艾。双方在共同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方面有更多契合面。

其次,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命运共同体建设强化了区域认同。中国与东盟合作抗疫生动践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诠释了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邻里之道。合作抗疫为双方化危为机、深化合作注入新动力。中国同东盟国家已结成201对友好城市。双方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交流日益深入。中国与东盟互为重要旅游客源国和目的地,2019年双方人员往来突破6500万人次,每周往来航班已近4500架次。双方互派留学生人数超过20万。<sup>①</sup>双方民众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为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最后,地区制度化建设日臻完善为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机制保障。在元首外交引领下,双方保持密切交往与沟通,各层级对话合作机制日益完善。双方建立了外交、经贸、交通、海关、质检等12个部长级会议机制,设立了外交高官磋商、联合合作委员会会议、经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和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等部门高官会议机制。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南海行为准则”(COC)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完成二读,双方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机制下深化合作,在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东亚峰会(EAS)、东盟地区论坛(ARF)等东盟主导的合作机制中保持良好沟通与合作。

当然,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也面临一些挑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地缘政治竞争冲击区域一体化建设。为遏制中国地区影响力上升,美国用尽心机“塑造”中国周边环境,极力推动集团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阻止中国倡议在东盟落地。美国提升“四方安全对话”(QUAD)级别,推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方联盟”(Chip4)等机制,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印太格局,强推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规则,挑战以东盟为中心的亚太格局,削弱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规则。东盟国家在安全、经济等领域面临来自美国“胁迫外交”压力,与中国很多正常合作受到干扰,一些项目甚至被安全化、政治化。地区原有的一体化进程被美国主导的硬力量网络切割,东盟对地区合作的牵引力被削弱,与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外部环境受到影响。

其二,区域内部矛盾掣肘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以及东盟国家之间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在域外力量挑唆下这些矛盾发酵甚至尖锐化,阻碍命运共同建

---

<sup>①</sup> 中国—东盟中心:《中国—东盟关系(2020年版)》,2020年3月13日,<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asean/dmzx/2020-03/4612.html>。



设的推进。地区国家内政矛盾错综复杂，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为了权利角逐，对华合作目标、路径、节奏、方式都有不同，一些项目被政治操弄，合作进程受到影响甚至被搁置。个别国家政治极化严重，对华政策波动大，严重影响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总体推进。

其三，地区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当前全球经济增速动力不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阻不畅、国际贸易需求疲软、全球及区域通胀压力加大，加之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导致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与粮食供应的不稳定，使得具有外向型特点的中国—东盟经济面临着严峻考验。在多重负面因素叠加影响下，一些国家出现汇率动荡、债务上升的情况，进一步升级为政治社会领域的不稳定。这些因素将影响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动力。

#### 四、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路径选择

面对纷繁复杂、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中国东盟需要利用好既有的基础和优势，把握好世界和平发展大势，努力化危为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于变局中开新局，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一是推进构建发展共同体。中国和东盟之所以能够成为地区合作的领航者，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始终将发展作为本地区第一要务。当前，中国和东盟都面临诸多发展难题，包括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在多重挑战重压下，双方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尤其是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快落实《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2-2025）》，促进全球发展倡议与《东盟共同体愿景 2025》协同增效。调动各方资源，加快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二是推进构建安全共同体。面对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回潮，中国与东盟更应坚定独立自主，高度警惕挑动地缘政治对抗、破坏地区合作的行径，避免落入他人地缘政治的算计。以全球安全倡议基本原则为指导，坚持以“亚洲方式”处理争议问题，管控分歧。坚决摒弃冷战思维，旗帜鲜明地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统筹维护传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加快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早日缔结共同的行为规范，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三是筑牢命运共同体人文根基。中国与东盟是亚洲文明重要发源地，共同积淀亚洲文明价值。面对美国等鼓噪“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挑动意识形态对抗，双方更需要携手合作，以全球文明倡议基本原则为指导，传承“亚洲价值观”，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将继续携手东盟，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强化人文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巩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民意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sup>①</sup>中国将坚定不移以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一如既往支持东盟团结和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不断为区域一体化建设注入新动力。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框架下，中国将与东盟真诚团结，排除干扰，同享机遇，共同成就，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 中国周边外交的新突破与增长点

韩爱勇

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鲜明对比是，一方面周边环境因美国对中国持续升级的遏制、围堵、打压而趋于复杂，周边外交的成本和难度不断增大；另一方面周边外交不断取得新进展和新突破，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大亮点。具体看，这些外交进展主要表现以下在三个方面。

### 一、顺势而为，不要求周边国家“选边站队”

正常来说，中国周边外交取得成功的标准，应该是大多数周边国家选择支持中国，而不是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现在之所以将“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队”视为周边外交成功的标准，根本原因是周边外交的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变。

---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1页。

中国崛起的速度和美国遏制中国的强度呈正比，这是影响当前中国外部环境的  
一大关键因素，也是这对关系促使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中国崛起带给  
周边外交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塑造周边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强，地区影响力也随之不  
断扩大，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发展模式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表明现代化道路不仅只有西方模式，中国的探索也可以为周边国家提供有益借  
鉴。二是地区经济中心的确立。经济学研究显示，早在2017年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  
价值链区块已经形成，中国在地区GDP、进出口总量中的占比均已接近50%，中国  
的地区中间品消费及供给占比已达70%，地区最终品消费和供给占比为55%左右。<sup>①</sup>  
整个地区开始以中国为产业链的中心环节来布局自己的产业发展，中国为主导的地区  
经济中心正在形成。三是地区安全影响力不断扩大。随着中国综合能力的提升和在安  
全领域投入的不断加大，地区安全的维护也越来越依赖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  
国安全政策的选择决定着地区安全局势的走向。这样一来，周边地区“经济靠中国，  
安全靠美国”的既有二元格局出现了“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也靠中国”的  
变化。<sup>②</sup>

地区影响力的失衡是导致大国间结构性矛盾生成的关键。为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  
力，美国开始采取“塑造中国周边环境”的战略，积极争取周边国家的支持。2017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印太战略”构想，目标设定就是要通过政治、经济  
与安全等手段，制衡中国日益扩展的影响力，维护“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平衡”。<sup>③</sup>2022  
年美国发布的《美国的印太战略》白皮书再次指出，“美国的目标是构建一种最有利  
于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以及我们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影响力平衡”。<sup>④</sup>2022年5月26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对华政策的演讲，明确提出：“美国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的行为，  
而是塑造中国所处的周边环境。”<sup>⑤</sup>为达此目的，近年来美国不仅重构地区同盟体系，  
强化其在地区安全领域的优势，而且还特别针对中国在周边地区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优

① 鞠建东、余心玓、卢冰、李昕：《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三足鼎立”格局分析》，《经济学报》2020年第4期，第2—13页。

② 韩爱勇：《中国周边地区双重结构性矛盾与印太联盟体系的构建》，《外交评论》2022年第5期，第88页。

③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25.

④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p.5.

⑤ Ant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势，出台“印太经济框架”（IPEF），联合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等具有显著经贸优势的地区盟友和伙伴国，在基础设施、数字贸易等具体议题领域组建针对中国的议题联合，<sup>①</sup>以期借此平衡中国的地区经济影响力。

这样一来，周边外交的主要矛盾由此转变为中国“塑造周边环境”的能力和“塑造中国周边环境”的能力之间的矛盾。对于中国而言，周边外交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争取更多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和周边政策的认同与支持。

这是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但问题在于这是中国的立场选择，而周边国家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原因有二：一是实力差距和地区影响力的结构性缺陷，使得周边国家很难在中美之间将中国作为第一选择。尽管中国发展迅速，但中国的整体实力和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存在“经济领域强而安全领域弱”的结构性缺陷。对于周边国家而言，经济收益固然重要，但国家安全不容有失，尽管中国确实拥有强大的吸引力，但可能无法作为它们最后的安全保障。二是为同中国全面竞争，美国手段尽出，彰显出它依然有力的同盟动员、国际叙事和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能力。这也让周边国家担心选择中国会招致美国报复。

反过来一样，出于同样的逻辑，周边国家也很难公开支持美国，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队”就成为理性选择。正如2023年6月2日新加坡副总理黄循财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所说，东盟国家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sup>②</sup>但实际上，周边国家“不选边站队”的难度越来越高，一是该政策并不符合中美的最佳利益，容易遭到大国的反对；二是近年来美国为平衡中国地区影响力，不断加大对周边事务的投入和对周边国家的拉拢，周边国家抵御美国诱惑的难度越来越大。

由此，中国周边外交策略需要做出相应调整，除加大周边外交的投入，更要顺势而为，由“争取周边国家的支持”转变为“让周边国家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事实上，中国确实做到了这一点。2023年6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指出：“国际社会普遍对中美关系现状感到担忧，不希望看到两国冲突对抗，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sup>③</sup>这表明中国对周边格局和周边关系新变化的认知是客观的，契合了大多数周边国家的内在需求。近年来的事实也证明，中国周边外交策略是成功的，

---

① 张景全、罗华婷：《拜登政府对华围堵复合联盟战略及中国应对》，《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6期，第41页。

② 《黄循财：新澳须坚持加强多边主义及保持接触》，联合早报网，2023年6月3日，<https://www.zaobao.com/news/singapore/story20230603-1400731>。

③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人民日报》2023年6月20日，第1版。

一个关键指标就是自 2017 年底中美关系恶化以来，除了日韩等少数美国盟友之外，大多数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保持了平衡而没有选边站队。而在实践中，这也成为中国周边地区尤其是安全局势基本稳定的基础。

## 二、确立中亚和东盟为周边外交的两个优先方向

2003 年 8 月 25 日，胡锦涛在驻外使节小型会议上首次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整体外交布局，<sup>①</sup>此后周边外交一直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居于“首要”地位。但周边地区由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等次区域板块构成，周边外交不可能平均用力，需要突出不同板块的轻重缓急，确立优先方向。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的一个巨大进展就是将中亚和东盟确定为两个优先方向，周边外交的立体感和层次感越来越清晰。

一是在中亚方向。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其视为外交优先方向。”<sup>②</sup>这是中国周边外交中首次出现“优先方向”的表述。随着双方关系的持续发展，2022 年 1 月 25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上的讲话中用“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好兄弟”四个好来形容双方的关系，<sup>③</sup>表明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系达到一个空前高度。

二是在东盟方向。2021 年 11 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上指出：“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东盟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中方将坚定不移以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sup>④</sup>至此，周边外交的两个优先方向得以确立。中亚和东南亚两个板块，一东一西，一个在海上一个在陆上，体现了周边外交的立体感。

但中亚和东盟有十六个国家，同样不可能做到平均用力，需要在“国家层面”将优先方向具体化。2023 年 6 月 27 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越南总理范明政时指出：“中方视越方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sup>⑤</sup>事实上，越南也将

①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91 页。

②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54 页。

③ 《习近平主持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 强调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2 年 1 月 26 日，第 1 版。

④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418 页。

⑤ 《习近平会见越南总理范明政》，《人民日报》2023 年 6 月 28 日，第 1 版。

中国视为其外交的优先方向，2022年10月31日，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华在同习近平会晤时明确表示：“越南高度珍视和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将发展对华友好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sup>①</sup>至此，从周边次区域到周边具体国家，都有外交的优先方向，周边外交的层次感更加明确。

综合来看，中亚和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拥有三个共同之处。首先，中亚和东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两个重点地区，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两个首倡之地。其次，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进展。从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起，与周边国家一道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长远目标。这一目标具体到周边各次区域板块，就是构建周边次区域命运共同体。在东盟方向，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提出“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坚持讲信修睦、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守望相助、坚持心心相印、坚持开放包容的五个努力方向。<sup>②</sup>这是中国首个地区层面的命运共同体倡议。需要说明的是，三周之后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才首次提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的理念。次区域命运共同体倡议早于周边命运共同体倡议，这也体现出中国对东盟的重视以及东盟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特殊位置。在中亚方向，2022年1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上首次提出“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并形成了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四项原则：坚持守望相助、坚持共同发展、坚持普遍安全和坚持世代友好。<sup>③</sup>

第三，这两个方向都拥有推进周边外交的坚实基础。在经贸合作领域，东盟连续三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自建交起已增长100多倍。除经贸外，有两点尤为值得关注。一是中国率先在这两个方向形成了清晰的地区政策。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提出四个“坚定不移”的东盟政策：中方将坚定不移以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团结和东盟共同体建设，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sup>④</sup>在中亚方向，2023年5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详细阐释了中国的中亚外交政策：建

①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64—74页。

③ 《习近平主持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5月20日，第1版。

④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418页。

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四个坚持”：坚持守望相助，坚持共同发展，坚持普遍安全，坚持世代友好。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的“八点建议”：加强机制建设，拓展经贸关系，深化互联互通，扩大能源合作，推进绿色创新，提升发展能力，加强文明对话。<sup>①</sup>地区政策的形成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进展，表明在中国的思维方式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不再只聚焦于中国自身的利益诉求，而是以整个地区的共同利益为目标。这在本质上也意味着，中国的地区行为正处于重塑的过程中。二是双方关系的制度化建设程度比较高。在中亚方向有中国—中亚峰会、上合组织、阿富汗邻国协调机制等制度性平台。在东盟方向则有“10+1”、东亚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香格里拉对话、香山论坛等涵盖各轨道的机制性平台。这些制度性框架安排为双方交往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预期，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制度，表明中国有意愿以制度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无疑提高了周边国家同中国交往的信心。

### 三、开拓出西亚和太平洋岛国两个周边外交的新增长点

界定中国周边地区，除考虑地理范畴和国家利益汇聚之外，影响力扩展也是关键因素。就此而言，西亚和太平洋岛国无疑是当前中国影响力在周边扩展最快的地区，连同双方关系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一并成为中国将其作为周边外交两个新增长点的原因。

在西亚板块，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的突破性进展表现为，双方关系的机制化平台建设迈出坚实步伐。2022年12月9日，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和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这使得双方关系发展在一天之内构建起两个机制性的对话平台，这种突破性的进展在其他地区板块是少见的。随着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的机制化进展，中国地区影响力也在快速提高。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23年3月10日，中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特和伊朗达成协议，同意恢复已中断七年的外交关系。沙伊复交的一个示范效应，就是鼓励西亚国家积极对话，推动整个地区出现“和解潮”：多个阿拉伯国家会商讨论叙利亚回归阿盟、卡塔尔和巴林恢复外交关系、土耳其和埃及改善双边关系、也门和平进程出现积极进展，等等。这些积极的变化既有助于化解伊斯兰世界内部不同派别间的矛盾，也有益于推动阿盟和非阿盟成员之间的和解。这表明，中国作为热点问题斡旋者有能力为西亚地区的安全稳定贡献力量，特别是相比美国民主改造中东失败

<sup>①</sup> 《习近平主持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5月20日，第1版。

所带来的地区动荡和混乱，西亚国家显然更认可中国的地区作用。

在太平洋岛国地区，中国与岛国的关系发展迅速，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双方探索出不同于其他板块的发展双方关系的新模式。2017年6月，中国政府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正式提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构建蓝色伙伴关系。<sup>①</sup>太平洋岛国位于大洋中央区位，海域广阔，潜力巨大，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定位契合了太平洋岛国的地区属性和国家特征，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岛国关系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周边关系的发展模式而言，中国—岛国的互动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总的看，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模式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中国—东盟国家”模式，先发展经济关系，而后逐步提高政治互信，进而开展部分安全领域的合作。简言之，就是“先经济后安全”。第二种是“中国—中亚国家”模式，先开展安全合作，而后发展经贸关系，进而推进双方关系的全方位发展。简言之，就是“先安全后经济”。但“中国—太平洋岛国”模式更接近于一种“经济和安全”平衡推进的模式。具体看，在经贸领域，一是中国同10个建交岛国均已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二是自1992年至2021年，中国同建交岛国的贸易总额从1.53亿美元增至53亿美元，年均增长13%，30年间扩大了30多倍。三是截至2021年底，中国对建交岛国直接投资达到27.2亿美元。<sup>②</sup>紧密的经贸合作夯实了双方关系持续发展的基础，也为岛国发展带来全新的动力。在安全领域，一是2017年以来，中国公安部共为太平洋岛国执法机构举办了23期能力建设培训，总计490名执法人员参加。<sup>③</sup>二是2022年4月，王毅外长和所罗门群岛外长马内莱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两国政府间安全合作框架协议。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与岛国的安全合作，既不是传统安全合作也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而是一种具体功能领域的“警务合作”，目的在于维护当地的治安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秩序。从实践上看，这种有限但必要的安全合作一方面应岛国

---

①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中国政府网，2017年6月20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7-06/20/content\\_5203985.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7-06/20/content_5203985.htm)。

② 《中国—太平洋岛国合作事实清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5月24日，[http://newyork.fmprc.gov.cn/web/zyxw/202205/t20220524\\_10691894.shtml](http://newyork.fmprc.gov.cn/web/zyxw/202205/t20220524_10691894.shtml)。

③ 《中国—太平洋岛国合作事实清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5月24日，[http://newyork.fmprc.gov.cn/web/zyxw/202205/t20220524\\_10691894.shtml](http://newyork.fmprc.gov.cn/web/zyxw/202205/t20220524_10691894.shtml)。



的请求开展，另一方面聚焦于维护社会稳定，<sup>①</sup>有效地推动了双方战略互信的达成。

这种全新的“经济和安全”双轮驱动的关系互动模式，最显著的效果就是推动双方关系实现了“全方位”的发展。随着双方关系的推进，继东盟和中亚之后，中国的第三个地区政策——“太平洋岛国政策”出台了。2023年7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时指出：“中国的太平洋岛国政策秉持‘四个充分尊重’：一是充分尊重岛国主权和独立，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二是充分尊重岛国意愿，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三是充分尊重岛国民族传统文化，坚持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四是充分尊重岛国联合自强，支持岛国落实《蓝色太平洋2050战略》，为建设一个和平、和谐、安全、包容、繁荣的蓝色太平洋作出贡献。”<sup>②</sup>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岛国政策的出台，双方关系的发展有望进入下一个快车道。

从战略全局上看，中国周边外交这两个新增长点的开拓有着突出的战略意义，西亚和岛国这两个板块整体上位于美国“印太战略”所覆盖范围的东西两端，盘活这两个板块，可以发挥“跳出内线、外线牵制”的战略联动作用。就此而言，中国周边外交取得的进展和突破无疑是多层面的。

【收稿日期：2023-09-16】

【责任编辑：丁懿楠】

---

① 《王毅阐述中所安全合作三项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5月26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x\\_673089/bzzj/202205/t20220526\\_10693097.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wjbx_673089/bzzj/202205/t20220526_10693097.shtml)。

② 《习近平会见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人民日报》2023年7月11日，第1版。

## ABSTRACTS

### 3 **Chin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chievements**

by Fang Changping, Zhou Fangyin, Lu Guangsheng, Liu Qing & Han Aiyong

【 Abstract 】 At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first conference on diplomacy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held in October 2013, President Xi Jinping emphasized, "China's basic policy of diplomacy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is to treat them as friends and partners, to make them feel secure and to support their development. This policy is characterized by friendship, sincerity, reciprocity and inclusivenes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country'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has made impressive progress in terms of both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results: Its main concern has shifted from economic and security factors to national strategy, the guiding principle from functional cooperation to emotive affinity, and its objective from neighborhood stability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Given the complex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neighborhood order, China has sought to play a more important and constructive role by adjusting the policies, positions and practices in its diplomacy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move in promot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ASEAN is a pilot zone for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Chinese neighborhood. Since the 18<sup>th</sup>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neighborhood diplomacy has made progress or breakthroughs in multiple dimensions: Central Asia and ASEAN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two priority regions, and West Asia and the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s two new region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Conference,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Forum* and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both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organized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hin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on September 16, 2023, where well-known experts from more than a dozen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held in-depth exchanges on this topic. What we present below are five articles written by the expert participants.

【 Key Words 】 Chinese diplomacy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ternational order, ASEAN, Central Asia

**36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volution and Assessment**

*by Wang Mingguo*

【 Abstract 】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RF) is the foremost coopera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framework. The preparation of the BRF not only involves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t also benefits from the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s in exploring cooperative mechanisms in various fields, and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existing cooperation mechanisms of the Belt and Road. At present, the BRF, which focuses on areas such as green development, energy, financing and trade, has grown into the hub of the ‘China track’ in global governance as its institutionalization keeps growing.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normative practic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BRF, it can be evaluated from two aspects: norms and overall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institutional platforms and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ms and overall institutional design, the BRF is a decisive move in creating international platforms for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the conceptual exploration and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platforms and mechanisms,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top-down Leaders’ Round Table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the functions of multilateral platforms in various fields continue to increase. At present,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RI has reached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It needs to enhanc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norm-making, improve the support mechanisms, docking mechanisms, and follow-up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of the BRF. It also needs to encourage stakeholderships among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and increase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multilateral cooperative mechanisms.

【 Key Words 】 The Belt and Road, BR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ultilateralism, global governance